

一般論文

# 陽剛特質與媒體職場的性別化實踐： 以報社攝影記者的工作為例\*

孫志硯\*\*

\* 本文改寫自筆者的碩士論文其中部分。本文之完成，必須感謝林鶴玲、吳嘉苓、藍佩嘉、張錦華、曾熾芬等諸位教授，以及中華傳播學刊兩位匿名評審的精闢評論。此外，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2005年會，感謝當時評論人林宇玲教授給予本文諸多指正。最後，本研究受惠於台大婦女研究室的性別研究碩博士論文研究計畫獎助，在此一併致謝。

\*\* 孫志硯為美國布蘭黛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Email: kensun@brandeis.edu

### 摘要

本文援引「王道式陽剛特質」的理論概念，論證性別如何深入攝影記者的實踐與互動，建構攝影記者的認同與文化。首先，脈絡化攝影記者的勞動現況後，本文論證攝影記者陽剛特質的建構，如何立基於主控他者的權力位置上。其次，藉由呈現鑲嵌於攝影記者人際互動中的陽剛特質，本文指出因為自身性別氣質無法打入此一人際網絡的男女攝影記者，如何錯失了各種資源，進而使得攝影記者勞動的高度陽剛面貌，變得更難以撼動。

關鍵詞：性別與工作、陽剛特質研究、情緒勞動、勞動社會學、性別與媒體



## 壹、前言

隨著港式跟拍文化進駐台灣，報紙攝影記者最常給人的印象之一，便是小報風格的跟拍狗仔。攝影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衝突，更不時見諸報端。中時影像部門主管黃子明指出，在台灣，新聞採訪現場往往極度缺乏紀律與規劃，許多攝影記者手持新型攝影器材，彼此衝撞以捕捉影像的場景，猶如「魔鬼終結中的阿諾，手持火力強大的新式武器（相機），扣著扳機（快門），一陣瘋狂的掃射（拍攝），然後痛快淋漓地結束任務」（黃子明，1993）。而許多媒體工作者，也都把攝影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爆發的衝突，視為極需解決的媒體亂象（孫瑋芒，2000；林育德，2002）。

相較於文字記者，攝影記者作為實務工作中的重要一環，卻甚少成為研究關切的主題（許靜怡，2003）。目前國內對於攝影記者的相關研究指出，當今攝影記者在工作上遭遇的對立衝突難以消弭，主要原因乃是根源於報社的分工型態與攝影記者的階級位置所致（黃義書，2004；鍾宜杰，2006）。這個現象一方面受到報業生態日益市場導向的發展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各大報社長期輕視攝影記者，使得台灣報業的攝影記者不僅壓力日益沉重，甚至連自己作品的呈現，都難以作主。例如，黃義書（2004）表示，攝影記者因為在報社內部組織缺乏決策參與權，受到文字部門與編輯台的支配，使得其專業養成一直受到漠視。此外，鍾宜杰（2006）則是以不同歷史階段的媒體生態背景為軸線，論證在商業化的報業市場趨勢下，攝影記者勞動過程與其成品亦日漸疏離異化。因此，攝影記者常無法培養專業，甚至最後只能淪為不斷爭先恐後競逐畫面的攝影工匠。這些分析點出了攝影記者工作中的衝突對立實際上有其結構成因，並與攝影記者的階級位置密切相關。

然而，當攝影器材被比喻為槍、攝影記者被形容為戰士時，歷來的研究卻忽略了這些敘述是如何生動地描繪出攝影記者工作中的陽剛氣質，並隱約暗示著勞動者的性別認同。相較於階級位置之分析，現有大

多研究顯然對攝影記者勞動過程中的性別政治，缺乏足夠的省思。進一步來看，性別研究者對陰性特質（femininities）的分析層次，已然十分細膩，但有關陽剛特質的分析架構，不論是在傳播研究或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仍有待強化。誠言之，將陽剛特質視為不證自明的壓迫結構，或是把所有男人一概等同為父權體制下的幫兇，皆是對陽剛特質分析的過度簡化，也無助於深入理解陽剛特質的運作邏輯與內部歧異（Carrigan, Connell, & Lee, 1985；Connell, 2005）。有鑑於此，透過分析攝影記者勞動場域的陽剛特質締連過程，本文希望脈絡化陽剛特質的建構過程，以期能在理論上豐富性別研究者對陽剛特質的分析，並在實務上豐富傳播研究者對攝影記者工作的了解。

筆者先前已經藉由分析報社定義與招募「理想攝影記者」的論述，探討各種性別偏見與迷思如何深植於新聞職場（孫志硯，2007）。在本文中，筆者將進一步申論關於「性別」與「陽剛特質」的各種想像，如何在攝影記者勞動實作中被動員與折衝，進而模塑了工作者的主體性。正如女性主義勞動研究學者申論，儘管工作組織能夠對其員工做出規範與限制，但卻不能「決定」勞動者的實踐與認同，因此既有的性別結構與意識型態如何被挪用成爲當代資本主義勞動體制管控生產過程的關鍵手段，必須放在工作者具體的勞動實作、人際互動與職場文化中理解（Leidner, 1993；Salzinger, 2003）。

循此邏輯，本文將進一步論證攝影記者的工作現況，乃是一種「體現陽剛的勞動體制」。筆者主張，攝影記者每日在勞動場域中的實作與認同，正是構築此一性別化勞動體制的關鍵所在。首先，本文將回顧文獻，探討如何理論化陽剛特質，並引介「王道式陽剛特質」（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概念，界定本文觀察報業攝影記者勞動現況的討論面向。接著，從媒體產製結構與新聞專業的角度，將說明攝影記者勞動過程中，一切衝突與對立的結構性成因。之後，本文將分析攝影記者如何藉由技術物的中介，展演出強悍的陽剛特質，並投射出彼此間的集體認同。同時，本文也將指出，攝影記者職場中的陽剛特質論述與實踐，如何



中介了經驗的傳承與資源的分享，並進而成為攝影記者克服勞動過程不確定性的重要管道。

## 貳、陽剛特質在勞動現場的形構

在性別研究領域中，「陽剛特質」相對而言是直至晚近才被開發的研究區塊（Connell, 2005）。為了避免將陽剛特質簡化為「男人像（想）什麼」，筆者將先引介不同角度的相關辯論，並說明為何「王道式陽剛特質」的理論概念，可以成為本文所倚重的分析架構。接著，透過檢視「王道式陽剛特質」在性別與工作領域的運用，筆者將進一步說明本文如何操作化「王道式陽剛特質」此一理論概念。最後，藉由回顧本土討論性別與媒體工作的研究，筆者也將說明陽剛特質研究如何能在概念與經驗層次，剖析新聞職場性別化的過程。

### 一、如何理論化陽剛特質：

#### 性別角色理論與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的觀點

早期，在功能論典範下發展出的性別角色理論（sex role theory），試圖以「內化」與「社會化」的概念，幫助研究者分析性別氣質的角色學習過程。性別角色理論主張男女被賦予了不同的角色期待，而社會中存有各種獎懲機制，也在控制人們確切遵守不同社會位置的角色期待。因此，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男女會習得不同的性別角色，加上工作又被賦予不同的性別標籤，最終，他們難免會傾向選擇符合自身性別氣質的工作型態（Padavic & Reskin, 2002: 76-78）。在性別角色理論的框架下，男性與陽剛特質的契合，乃是社會化過程的最終產物。

許多後進的女性主義者批評性別角色理論的分析過於僵化，不但無法回答性別角色規範的形成過程，反而常將性別差異簡化為靜態的既定格局。對此，女性主義精神分析者試圖論證「家庭」是複製既有性別差異與分工的根本原因（Chodorow, 1978；Rubin, 1975）。例如，Chodorow

(1978) 申論，由於男性在家庭成長過程中，被迫與母親分離，也因此被迫壓抑自己對母親（女性）的情感與認同，轉而學習被社會認可的陽剛特質，並建構出自己的性別認同。至於人類學家 Rubin (1975) 則主張，家族網絡是複製男性優勢位置的主要場域，讓男人學習制約自身的陰柔氣質與同性情欲，並學習認同家中握有權力的男性（父親）。

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者的分析指出，陽剛氣質並非本質差異，而是經由家庭此一社會制度的複製與延續；然而，女性主義精神學派對於男性特質的分析，過於強調早年家庭生活如何作為性別認同的核心，卻對行動者如何在不同社會情境與制度環境（如學校、職場）中持續重構自己的性別認同略而不提 (Williams, 1989: 12-13)。此外，女性主義精神分析者過於強調性別如何被建構成二分類屬的傾向，也使其無法深入區辨陽剛特質內部的歧異性 (Messner, 1992: 21)。Chodorow (1989: 4) 在回應對這些批評的時候，承認其早期著作的侷限，並且同意性別認同與氣質確實會在不同的歷史脈絡與社會情境下產生變異。換言之，儘管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理論點出男性集體優勢權力位置的延續，有其社會建構過程，但對於陽剛特質內部的多元差異與高下有別，卻未能提供合適的概念工具加以解釋，亦未能進而區辨身處不同社會位置的男性，鞏固自身位階與權力的方式往往大不相同。

## 二、王道式陽剛特質：概念的界定與構連

面對前述觀點，Connell (2005) 則是援引葛蘭西 (A. Gramsci) 對「王道」(hegemony) 的分析，進一步發展「王道式陽剛特質」的概念，以超越結構、個人的二元對立，申論陽剛特質的社會建構如何高度依賴文化共識，以獲取主體的順從 (complicity)。

首先，根據 Connell (2005: 77) 的定義，王道式陽剛特質之形成，必須透過日復一日性別化的實踐，始確保父權體制的正當性 (legitimacy)，以及男性控制女性的集體優勢權力位置。他藉由「王道式陽剛特質」對照在社會文化中不斷被推廣、美化的陰柔特質，論述男強女弱的性



別腳本如何在各種制度脈絡中被動員與實踐，以鞏固結構與文化上的男性霸權；他並認為，「王道式的陽剛特質」雖是過於浪漫化的性別圖像，常只能被極少數人真正落實，但卻可以作為一種文化共識，引導大多數人不斷追尋渴望（Connell, 1987）。

此外，相對於「王道式陽剛特質」，Connell（2005）也以「邊緣化的陽剛特質」（marginalized masculinities）與「受壓抑的陽剛特質」（subordinated masculinities），區辨男性在父權體制下的受惠程度差異，並指出陽剛特質內部的階層化，不僅壓迫女性，也使許多男性受到歧視。循此邏輯，加上性別研究者對差異政治的日漸重視（Zinn & Dill, 2000），包括 Connell 在內的許多研究者均開始複雜化其分析，討論陽剛特質如何在特定時空脈絡下，與階級、種族、性取向等社會類屬相互切割（intersect），呈現多元的性別權力圖像（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Pascoe, 2007: 7-10）。<sup>[1]</sup>

黑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 Collins（2005）進一步申論，王道式陽剛特質的界定永遠需要「他者」（Others）的存在。而美國社會所推崇的王道式陽剛特質，正是仰賴於與女人、男同性戀者、勞工階級、有色人種男性等「偏差」他者形象之對比，才得以建構出白人中上階級男性的優越圖像。同樣的，呼應女性主義理論對「差異」的重視，Connell & Messerschmidt（2005）則以「多重面向性」（multidimensionality），強調陽剛特質的生成，必須放在特定場域的性別、階級、種族、性取向等多重座標軸線下，加以界定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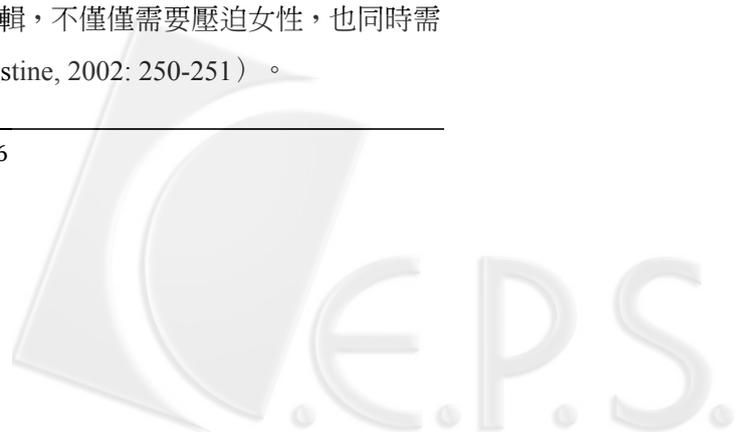
Hondagneu-Sotelo & Messner（1994）即發現，許多隸屬中下階級的美國拉丁裔男性，便因受限於其物質基礎，無法如中產階級男性一般，藉由事業、財富等外在資源彰顯自己的「男子氣概」，只好透過貶抑女性與同志，或是採取凸顯個人體力或性能力的論述策略，以展現其不亞於中產階級男性的陽剛形象。而他們與其他研究者也發現（Pyke, 1996；Messner, 1993；Hondagneu-Sotelo & Messner, 1994），透過對比藍領階級男性「粗獷」、「原始」的他者面目，許多中上階級男性得以強調

自身的文明、優越，也取得為社會讚許的新好男人（new man）形象。然而，這些看似進步開化的「新好男人」面貌，大多只改變陽剛特質的「形式」（style），卻未曾改變中上階級男性掌控多數資源，及其作為壓迫體制下最大得利者的實質。

### 三、王道式陽剛特質的應用與操作化：以性別與工作領域為例

許多性別與工作研究者也應用「王道式陽剛特質」的理論概念，檢視職場中勞動者實踐與認同的性別化建構過程（Williams, 1995；Pierce, 1995, 1998）。例如，Pierce（1998）延伸 Hochschild（1983）對「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的概念，討論「王道式陽剛特質」如何在美國律師的勞動過程中構連生成。她發現，訴訟律師的專業其實立基在一套「對立模型」（adversarial model）之上，因此不論是學校教育或實務過程，整個領域的文化均不斷鼓勵受雇者展演強勢、堅定，與侵略性等主流陽剛特質。她並舉例指出，在法庭辯論中，男律師常交互運用威嚇（intimidation）與策略性善意（strategic friendliness）等兩種情緒手段，達成征服對手、贏得訴訟的目的。相較於男性，女律師則常被同業與客戶假定為不夠強悍、缺少侵略性，較難成為成功的訴訟律師（Pierce, 1995, 1998）。

Dellinger & Christine（2002）則是以男性更衣室（locker room）的隱喻，描繪其研究樣本中，一個主要以男性為銷售對象的色情雜誌編輯部所具有的陽剛文化特質。她們發現，儘管工作中充滿各種貶抑女性的言論與玩笑，該其編輯部的男女員工卻早已習慣，並常以「幽默」與「工作所需」為名，駁斥外界將此視為性騷擾的可能；同時，他們更常以「自由」、「解放」等修辭，描繪其職場氛圍對性言論的包容，相較之下，該雜誌的讀者及許多其他部門的男性，則常被喻為拋不開「傳統」性別迷思的沙文主義者。由此可見，該編輯部界定性騷擾的尺度，正代表著「王道式陽剛特質」的建構邏輯，不僅僅需要壓迫女性，也同時需要貶抑其他男性（Dellinger & Christine, 2002: 250-251）。



此外，陽剛特質也常鑲嵌於男性主導場域中的非正式人際關係與互動過程，藉由排除與收編的兩面手法，建立鞏固男性為主的社會網絡，並讓女性錯過許多與工作密切相關，但須依靠人際網絡而傳播的資源（Roos and Reskin, 1984；Wajcman, 1999）。例如，Allison（1994: 14）指出，日本企業習以為常的夜店女服務生陪酒文化，乃是一種強化主流陽剛特質的儀式。藉由女服務生情慾化的表現，許多男性消費者從中再次確認自身的男子氣概，而許多企業則是藉此場合攏絡客戶，完成商業交易的目的。<sup>[2]</sup>黃淑玲（2003）也主張台灣男性「喝花酒」的文化，正是以消費女性作為手段，欲達成複製王道式陽剛特質的目的。

#### 四、陽剛特質研究與媒體勞動性別化研究的對話

許多國內外研究已經揭露性別意識型態深植於媒體職場，並產生限制女性新聞工作者職場發展、甚至排除其參與的效果（van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梁慶瑞，1991；沈怡，1995；廖郁毓，2002；賴維真，2003；蕭蘋，2004；孫志硯，2007）。因此，女性新聞工作者常須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證明自身能力能夠與男性同儕並駕齊驅（Skard, 1989）。

舉例而言，蕭蘋（2004）研究女性政治記者時發現，社會對母職的期待與報社內部對女性特質的刻板認知，常使得女性新聞工作者必須藉由「去女性化」的表現，才能在這些傳統以男性為主的新聞路線中，獲得上司與同儕的認可，進而得到升遷機會。換言之，在男性為主的媒體勞動場域，較諸陰性特質，陽剛特質往往受到更多肯定，也常被當作「適任」與否的重要指標。由此觀之，陽剛特質與男性優勢權力位置的延續，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儘管目前研究已經指出陽剛特質如何作為男性主控媒體組織的關鍵原因之一，然而對於陽剛特質如何在新聞職場得以不斷延續的過程，卻仍缺少進一步的深究。有鑑於此，本研究透過以報社攝影記者的工作作為個案，不僅僅希望對攝影記者的工作現況進行「經驗補白」，並且

據以瞭解陽剛特質如何經由勞動者的職場實踐進行產製，進而成為延續男性優勢權力位置的重要機制。

藉由「王道式的陽剛特質」此一理論概念與相關應用的引介，本文將呈現行動者如何在具體的制度環境，以及諸多正式與非正式的互動與實踐中，挪用各種文化想像與象徵符號，管理定義性別界線（boundary）的具體作為（Messner, 2000）。以下，筆者將分析攝影記者在拍攝新聞照片的勞動過程中，如何受到現有媒介生態與組織分工影響，導致其高度陽剛的職場實踐。接著，本文焦點將轉向攝影記者在工作中的 interpersonal 互動，分析陽剛特質如何被動員以連結同業人脈，並作為資源交換的重要管道。

## 參、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作為收集資料的主要方式。本研究一共訪談 34 位男女攝影記者。訪談進行時間從 2003 年 9 月，持續到 2004 年 3 月。訪談長度最短一小時，最長兩小時左右不等。接受訪談的攝影記者包括 16 位曾任及現任於報社的女性攝影記者、12 位在報社任職的男性攝影記者，以及目前專任報社攝影部門主管的資深攝影記者 6 位（見附錄表 A）。透過訪談，本研究希望可以了解當前報業生態與攝影記者勞動間的關聯。

訪談對象的尋找，我採取立意滾雪球抽樣法（purposive snowballing method），透過攝影記者相熟的人際網絡，找尋適當的受訪者。立意滾雪球抽樣能夠幫助本研究更深入地了解攝影記者的人際網絡；接觸任職於同一媒體的不同攝影記者，也有助於本研究多角度地了解組織文化各個面向。同時，為了避免滾雪球抽樣導致受訪者同質性過高，我在尋找合適的資訊提供者時，也考量了年齡、教育、資歷、在報社內部的 position 等社會因素，試圖擴大受訪者背景的多樣性。

本研究訪談的核心問題，包括：攝影記者選擇此一工作的理由、每

日例行性的工作流程、完成工作的過程、在職場中與人互動的方式，以及對攝影記者職場男女比例懸殊的看法等；此外也針對受訪者的每個回答進行追問。每次訪談內容均全程錄音，在訪談結束後，則著手撰寫田野筆記，記錄無法透過錄音呈現的資料，如邀訪經過、訪談進行地點與氛圍，以及訪談中印象深刻的片段等。

完成訪談工作後，我不斷檢閱相關文獻，以尋求解釋研究資料的架構。在大量閱讀研究男性主導職場的文獻之後，我決定以「王道式陽剛特質」的理論概念，重新定位整理本研究的發現與意義。透過反覆閱讀訪談逐字稿與田野筆記，並對照先前有關陽剛特質研究的成果，本文援引 Messner (2000) 的觀點，將攝影記者勞動經驗歸結成實踐、結構、與文化三個分析層次。在實踐層面，我著重於攝影記者職場中的人際互動方式；在結構層面，我關注於模塑攝影記者工作的制度性力量，如媒體組織與報業市場的現況；在文化層面，我則聚焦於何種符號 (symbol)、隱喻與儀式被攝影記者頻繁使用來形容其工作。而這三個層次在概念上各自獨立，但實證上緊密連結的關係，本文也將在攝影記者正式與非正式的職場實踐部分，從事討論與呈現。

此外，由於我未曾擔任過攝影記者，因此幾位攝影記者所撰寫的學術論文 (黃義書，2004；鍾宜杰，2006)，以及攝影記者陳述工作現況與經驗的網站「攝論」，<sup>[3]</sup>則是大幅幫助本研究深入了解攝影記者的職場文化與認同。

## 肆、在攝影現場中體現的陽剛特質

攝影記者給人們的印象，常來自於電視螢幕上衝撞、推擠，甚至扭打的畫面。無論報導、訪談或先前的研究都指出，衝突與對立的場景，對攝影記者來說並不陌生。訪談時，我發現攝影記者工作中常見的衝突場景並非個人特質使然，反而有其結構成因。以下將先從報社管理組織攝影記者工作的制度著手分析，接著，透過攝影記者描繪工作的類比形

容，我將指出攝影記者如何藉由確立自身在勞動過程中的主控位置，以克服現況勞動過程裡的不確定性，進而在職場中，產生建構陽剛特質的效果。

### 一、攝影記者工作中衝突與對立的結構性成因

媒體第四權的監督批判立場，常引發受訪者與記者間的緊張關係。同樣的，攝影記者以影像傳遞訊息的過程中，也常因為立場不同而與採訪對象對立。攝影記者 A5 便以自身與政府公關部門的衝突為例，具體說明了這點。

有一次，我去採訪 IDF 聯隊成軍的時候，他們去試飛，因為他們有一架飛機，就是起飛的時候發生搖擺的現象，那一次我有拍到嘛，那個空軍新聞官現場也知道我有拍到那樣的〔畫面〕就來說項，就希望能不要發表啊，我是覺得說，就我的角色來說，我不可能不去發表這樣的東西啦！雖然，我們是你邀請來的採訪單位，但是基於我的工作，我還是要發表那樣的東西。另外有一次是我跟總統府，以前總統府一個公共事務室的什麼人，他曾經，有一次在總統府內我去採訪的時候……他就跟我抱怨，我上次拍總統跟外交部長，兩個人講話那個樣子，他覺得好像對總統不敬，那我聽當然覺得很不舒服啊，我認為怎麼可以用這種比喻來跟我說項……我說我們採訪的角色，跟你們不太一樣，我們並不是總統的化妝師……當然他們可能會包裝設計很多這樣的活動或行程啦，但是我們的心態，我們不會認為說，我來這裡是要拍很美的照片，我不會這麼認為，他那天在總統府就當著所有進去採訪的記者面前，就一直跟我 argue 這種事情。（受訪者，A5）



正因為新聞專業預設了對採訪對象的監督與批判，所以潛在的對立與衝突，常不利於新聞記者採訪工作的進行。許多研究都指出，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新聞記者常仰仗與採訪對象的友好關係，以化解「監督者」與「被監督者」間的潛在矛盾，進而確保自身能夠順利完成採訪任務（臧國仁，1999）。而記者如何既站在客觀中立的批判性專業位置，又與消息來源維繫良好的彼此互動，向來是傳播研究者關切的主題。許多研究也指出，與採訪對象的互動，不但花費記者的時間、精力，也是他們採訪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臧國仁、鍾蔚文、楊怡珊，2001）。

不少攝影記者的確表示，如果能夠與採訪對象建立良好互信的互動關係，將能相當程度地減緩彼此之間的對立衝突。然而，報社攝影記者的工作卻基於以下四個理由，使得他們無法如同文字記者一般，依賴經營人脈來減緩採訪工作導致的緊張狀況。

第一，攝影記者所拍攝的對象，不見得是有組織的消息來源，更不見得是習於面對鏡頭的公眾人物。許多受訪者對於攝影記者的防備與不信任，實際上有其歷史根源。資深攝影記者黃義書（2004：10-11）指出，台灣早期街頭運動興起之初，攝影記者拍攝的照片，常被警方用來當作逮捕滋事份子的證據；在2004年，高雄地檢署也曾經以攝影記者拍得的照片為佐證，起訴率眾開車衝撞警察的立法委員邱毅。因此，時至今日，攝影記者在街頭抗爭運動中，被抗議群眾阻擾拍攝、甚至追打的新聞仍時有所聞。而近年來港式狗仔文化進駐台灣，其侵入性的拍攝手法，更引起不少受訪者對攝影記者的反感。事實上，許多採訪對象只要看到拿著鏡頭的攝影記者便高度警戒，許多攝影記者更面臨「狗仔記者」的貶抑羞辱。

第二，由於報社攝影記者「不分線」，使得攝影記者在建立人際關係上，較文字記者更顯格外困難。目前各報攝影記者原則上採取的「不分線政策」，也就是說，除如體育、影劇等少數獨立出來的路線外，<sup>[4]</sup>大多數的攝影記者並沒有固定專屬的新聞路線；攝影記者的採訪任務，是每天由報社攝影部門主管分配。採取不分線政策，其實與各報追求精

簡人事成本的要求密切相關。畢竟報紙版面仍以文字為主，而且每天需要拍攝、捕捉重要畫面的新聞並不固定，故在人事成本的考量下，各報攝影記者人數均遠遠不及文字記者。易言之，攝影記者不分線，等於是讓報社彈性運用攝影記者人力的做法。所以，不同於文字記者能夠根據路線培養人脈和消息來源，攝影記者往往必須背著沉重器材，四處奔波拍攝大量的新聞照片（孫志硯，2007）。

進一步來看，採訪對象本身也未必願意花時間與攝影記者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當消息來源清楚理解文字記者才是主導新聞走向的關鍵時，他們當然不必特意與攝影記者交際。報導攝影工作者楊映便明白表示，許多記者會的主辦單位或是公關公司，其實清楚哪些是文字記者、哪些是攝影記者；當媒體的版面及內容主要決定權操縱於文字記者之手時，這些主辦單位與公關公司大多「非常清楚他們『伺候』的對象是文字記者，而非攝影記者」（楊映，2001.02.25）。

第三，與消息來源培養良好的互動關係，也未必能夠幫助攝影記者順利完成工作。由於文字與影像的特性有所差異，因此報社往往要求文字記者負責整體敘述結構，再由攝影記者補強版面視覺的情緒渲染效果。《聯合報》資深攝影記者林少岩（1998.07.01）指出，「文字傳播的長處在於深度和廣度，短處在於傳播的速度。圖像或視覺的傳播正好相反，其長處在於傳播的快速，弱點則是深度和廣度不足」。他並認為，相較於文字記者擅於敘事，但震撼力無法立竿見影，攝影記者所拍攝的圖像雖然可以直觀感受，卻常「只表達一個簡單的意念或情境，震撼力立竿見影，呈現的卻只是事件中極小的一個片段，敘事難以周全」（林少岩，1998.07.01）。

相對於文字記者需要承擔整體敘事架構的責任，攝影記者所被賦予的期望，往往在於能夠捕捉某一瞬間的場景，以創新的構圖呈現視覺震撼效果（方秋湖，1999）。因此，即使採訪對象願意配合，都未必能讓攝影記者充分捕捉到理想中的新聞畫面。過去台灣許多攝影記者常存有得過且過的心態，甚至會要求受訪者配合「重演」新聞現場（黃義書，

2004)。然而，近年來媒體競爭壓力不斷加劇，要求受訪者配合演出一些墨守成規的照片，往往被報社編輯與主管認為難以吸引讀者，上報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正如訪談中主管 A2 所言：「那種四平八穩的新聞照片，就不用送來了，來了也不會登」。<sup>[5]</sup>

第四，相機與鏡頭的侵略性，則是在攝影記者與採訪對象間，進一步強化緊張關係的重要原因。當攝影記者必須拿相機貼近不願見報的採訪對象時，相機與鏡頭便成爲一件具有侵略性的武器，使得彼此的矛盾再難化解。事實上，許多攝影記者也並不否認相機具有侵略性格。訪談中，不少攝影記者表示，他們因爲工作需要，往往必須手持相機與鏡頭，近身貼近受訪者。而被攝者面對鏡頭時，一方面感到壓迫與無助，另一方面，他們也往往不知道這張相片會在何種情境下，搭配何種圖說及新聞稿呈現，內心自然深感不安。攝影記者把相機類比爲槍，還把自己的工作形容爲軍人，正是說明相機侵略性的最好例證。

基本上「相機像槍」這個比喻……其實講得很正確，相機的聲音跟 machine gun 的聲音也是很像，喀喀喀……只要你被鎖定當成目標的那個人，你就必須接受由鎖定你的人〔所發出〕的動作，他是很殘忍的，如果是軍人拿著槍，你的生命操縱在他身上，他隨時可以把你 shot down，把你射倒。那拿照相機的人，當他鎖定你的時候，他喀喀拍的是什麼？是你整個人，當你發現他在拍你，你會很不舒服，你逃離不了他的感覺，那種感覺是很不愉快的經驗。（受訪者，A12）

將相機形容爲槍，背後顯示的其實是攝影者與受攝對象間的衝突矛盾。攝影記者鍾宜杰（2006：86-87）指出，現況下有些攝影記者也會刻意透過鏡頭的操弄，操弄受訪者的情緒，以追求衝突或具有震撼力的照片效果。



攝影記者使用廣角鏡拍攝，<sup>[6]</sup>除了可以輕易將不起眼的畫面營造出戲劇性的誇大之外，還具有「激起受訪者情緒」的戲劇性效果，以增加拍攝到意外畫面的可能性……當鏡頭集中與靠近時，就暗示著抗議群眾要喊一些激情的口號、做些誇大的動作，讓畫面好看、讓記者好交差……另一種例子就是當事人拒絕受訪，攝影記者便以廣角鏡貼近當事人，形成壓迫感，直到當事人情緒上升，不耐而有所反應時，正好掉入記者的圈套，成為被拍攝的時機，再而對畫面或照片斷章取義或穿鑿附會地擴大解釋（鍾宜杰，2006：87）。

究竟一張「好照片」的定義為何？本研究透過訪談所得到的答案，不外乎「藝術是非常主觀的」、「構圖具有創意」或「這很難說，好照片可遇不可求」之類。然而，從攝影記者的實務操作看來，是不是一張好照片的判準，其實掌握在報社主管主觀上對照片「新聞價值」的判斷取捨（黃義書，2004）；有些受訪的攝影記者也不諱言地指出，自己同樣以「可以上報」當作拍出好照片的優先準則。因此，當專業養成缺乏，市場競逐與考績壓力日增，甚至影響到新聞價值判斷的時候，攝影記者運用器材以換取衝突、震撼，且可以上報的照片，便不難理解。

當然，這並不意謂「持有相機的攝影記者」與「面對鏡頭的採訪對象」之間，具有本質的對立與衝突。反之，攝影器材所造成的緊張關係，應該被放在新聞工作實務、組織與操作之下理解。正如女攝影記者 A19 所言，相機鏡頭確實會對採訪對象產生壓迫感，但若攝影記者可以多花時間與採訪對象建立信任，再逐漸改換比較短的鏡頭拍攝，對方會比較容易放下心防。

不過，目前轉任雜誌社攝影記者的 A19，也承認其拍照手法很難落實在報社攝影記者的工作環境中。簡單地說，雜誌每天處理的新聞種類多屬專訪，比報社單純，工作時間也較充裕，因此攝影記者較能撥出長一點時間與採訪對象互動，慢慢拍照。但另一方面，正如許多攝影記者



的親身經驗，那些建立關係之後拍出來的畫面，也未必就是報社最想要的照片——有時報社正是需要一張受攝者最不願見諸報端的照片來吸引讀者。由此觀之，報紙攝影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矛盾，更難有消解的可能。

最後，除了與採訪對象的糾葛，攝影記者另一個需要面對的挑戰，便是同業的競爭與衝突。為了拍到最好的畫面，攝影記者往往需要與其他的同業推擠卡位，這些無法避免的碰撞，既是攝影記者工作最爲人所熟知的特徵，也是攝影記者工作的主要衝突來源之一。訪談中，諸如「戰士」、「拳擊賽」，與「美式足球」等有關競賽的隱喻，常被攝影記者用來形容自身克服同業衝突的過程。藉由「競賽」這個概念，攝影記者不僅說明完成工作的困難度，同時也強調了完成工作如同在競賽中追求勝利一般。這些隱喻，展現出攝影記者對於工作的理解，進而左右其勞動實踐。

## 二、陽剛特質的構連：以強勢作爲克服衝突對立的手段

由於緊張與對立，可能爲攝影記者的工作帶來不確定性和阻礙，因此，攝影記者往往刻意顯現自身的強悍，作爲一種手段，以克服這些勞動過程中的困難。換句話說，訓練攝影記者能夠適時展現強悍，也是重要的功課。例如，主管 A10 常訓誡下屬，希望他們在工作時，以強悍的姿態取代自己原本謙遜溫和的習性，以利採訪任務之完成。

人家說〔攝影記者〕該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尤其是動如脫兔，我看現在是兇如猛虎，在這環境造就之下你不可能很謙虛，那你就不要拍了……尤其你企圖心愈強，我非要那個畫面的話，就要想盡辦法去達成那個目的。造就之下你會比較粗獷一點、比較有侵略性……這是我一直強調同仁的……像有幾個我很煩惱的，不要太老實，我覺得要有點壞，不是你去壞人的壞，而是反應要靈敏，你要驅動力很強，像惡

虎一樣該撲就撲上去了，要不然那個新聞點發生張力最夠的圖像你就 catch 不到。你這樣養成訓練自己氣質的時候，反而我鼓勵啊，你可以再壞一點，不要那麼老實，以前我們很凶悍的，該打架就打架，該吵一吵就吵一吵……我們以前還跟憲兵打架勒。（受訪者，A10）

再者，要求自己狠心，展現強悍，也是攝影記者克服心中不忍的重要策略。女攝影記者 A25 便比較了自己在學生時代的攝影經驗，與後來擔任攝影記者拍照的差別，並描述自己如何調整心態，以拍攝那些不忍卒睹的畫面。同時，她並以「學習具有男性特質」，描述自身在工作之後的調整及轉變。

因為我要拍到對方的照片，我一定要跟他面對，那攝影記者強悍一點是一定要的啦。因為你每天面對到的環境不一樣，你如果沒有辦法把自己練強悍一點，你可能臨時出了一點什麼狀況，你工作就沒有辦法完成……我也是靠工作慢慢累積起來這種強悍性格。像我有時候，拍醫院，你看到病人躺在床上，你真的覺得他真的好可憐喔，或是怎麼樣，你會拍不下去，可是如果我是一個攝影記者，我只是要傳達給人家看。我就是拍，那時候，我覺得可能強悍一點會比較好吧……我覺得我說的男性特質是在這一點，所謂就是不怕吃苦、不怕各種混亂的場合，我都可以舉起我的相機勇敢的就是拍……工作很多地方我覺得是一種訓練吧，也可以說是一種妥協吧……像是醫院、病人、老人什麼，我可能會覺得不忍心，可是我必須要拍照片讓讀者看說，發生了什麼事情。沒有照片他們只看到文字，是沒有那種感受的。但那時候，你想法一轉，你還是以工作為主。漸漸久而久之，會比較習慣，有點像是社會化一點……當了攝影記者之後，你的個性也會

改，以前個性就是會比較軟弱一點啦。現在，拍照跑了很多地方，見過很多人，可能會變得比較強悍一點啦。（受訪者，A25）

受訪者 A25 的經驗說明，她進入職場後，經歷過一段自我調適，訓練自己符合「強悍」的期待；但事實上，即使是男性攝影記者，也都有著類似的經歷。當然，絕大多數的女性攝影記者，均曾被懷疑不夠強勢、無法勝任，所以當幾位女攝影記者被問到「是否曾因性別而在職場上受限？」她們立刻斬釘截鐵地告訴我，性別不是問題，女性也可以如男性同業一般，表現出強勢的一面。有趣的是，女攝影記者對於自己能夠「如同男人一般硬頸」的強調，更清楚點出陽剛特質已是攝影記者勞動現況的重要環節。由於察覺到自己是職場少數，工作能力常受旁人質疑，因此女攝影記者總得表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氣勢，才能在男性為主的職場得到認可。這也暗示了在分工架構、報業生態未改變的情況下，更多女性的參與，未必就能改變攝影記者工作的性別形象。

總之，不論是所謂的「侵略」、「粗獷」或「霸氣」，都代表攝影記者在勞動中展演「合宜」情緒的必要。也唯有藉由這些強勢的自我呈現，攝影記者才得以克服許多採訪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與阻礙，以順利完成工作。進一步來看，透過軍事、戰爭與競賽等各種隱喻，不僅點明了攝影記者透過身體與技術物所欲達成的主控位置，而其所宰制的多重客體，包括受攝者與同業，也涵蓋了男人與女人。相對於受控的他者，攝影記者展現著自己如何作為掌控權力的主體。至於許多受訪者以「像個男人」類比攝影記者主控權力的說法，則是進一步點明陽剛氣質背後對照的男性樣貌。

另一方面，由於衝突、對立是攝影記者經常面對的場景，他們也習慣藉此來強調並再現自身工作的難度；所以相對地，某些被視為乾淨的、容易的、輕鬆的採訪路線，則被許多攝影記者認為技術難度低且見報率不高，是「適合女性跑」的路線。例如，主管 A6 與 A7 在談到「適

合女性主跑的路線」時，便是舉影劇藝文新聞為例。但諷刺的是，所有常主跑影劇藝文新聞的受訪攝影記者，都對這樣的說法感到不以為然，甚至覺得受到侮辱，他們駁斥這完全是其他攝影記者在不了解事實情況下所說出的偏見。

**問：**有人認為影劇新聞適合女攝影記者跑，大哥你認為呢？

**答：**影劇跟一般新聞都是一樣，因為他要消耗非常大的爆發力……影劇最大的不同是：它新聞大多是壓縮在下午，十二點以後，可能五點之前。中間這幾個小時，它壓縮得很緊。一般的新聞可能沒有壓縮，它可能早上一條新聞、下午一條新聞，它還可以拍一些畫面可以傳進去，但是影劇不行，所以為什麼影劇要求的難度會比一般更難。它的瞬間，它的直接反應，它的要求、訓練，會比其他更高……認為影劇新聞輕鬆，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我曾經也給某報一些影像中心的攝影〔記者〕去拍過新聞，他們拍出的東西沒有一張可以用。怎麼說，他們習慣以報導的方式來拍，但是影劇的東西不能。他們習慣用廣角去壓縮一個畫面，人會變形，影劇的東西一變形就不能看。假如說那個明星很帥的，你這樣一壓，他頭大身小，能看嗎？不能看。影劇的東西嚴格比他高〔要求比較嚴格〕，所以質感高，他們覺得是很容易，其實到他們拍的時候他們覺得是非常難。（訪談資料，A6）

事實上，當我在詢問「女性是否適擔任影劇線攝影記者」時，我並沒有預期攝影記者會把「女性適合擔任攝影記者」這樣的說法，當作對自己工作與技術的貶抑。藉由強調自身的勞動需要技術難度，並且高度耗損體力，這些常主跑影劇的攝影記者再次駁斥了女性適合擔任攝影記者的看法。上述的回答，清楚指出性別如何在其勞動場域中，作為指涉技術能力層次高低的表意邏輯與象徵意涵。亦即，在攝影記者的勞動場

域中，勞動與技術的「女性化」（feminized）屬於貶抑而非褒揚。相較於男性，「女性」不僅僅是體力較弱的表示，也常被視為專業技術較差的同義詞。由此性別化的語言邏輯觀察，可以再次確認，女性攝影記者在職場中，常背負著「偏差他者」的形象。至於攝影記者對自身專業與性別認同的確立，往往乃是憑藉著對女性特質的排除與貶抑而得。

## 伍、攝影記者的陽剛特質與社會網絡鏈結

由於認知到攝影記者為了工作，彼此競爭激烈，甚至肢體碰撞、言語衝突在所難免，因此進行訪談之前，我其實先假定了攝影記者的同業關係應該並不友善。然而，不少受訪攝影記者卻形容，工作中的衝突不但不影響感情，反而因為他們在報社裡，同樣身為弱勢的一群，也同樣面對相當辛苦的工作處境，導致他們培養出一種「患難與共」的兄弟情誼（brotherhood）。

攝影記者如何能既競爭、衝突，又同時培養兄弟情誼？Messner（1992: 88）的研究指出，這種既對立又合作的情形，也常出現在職業球員的身上。他發現，職業運動比賽儘管強調團隊精神（teamwork），但運動員間的競爭其實暗流洶湧，因為每個人都試圖向金字塔分工結構頂端攀升。當某位高勝率、高待遇、高人氣的明星球員向上攀升時，往往意味著其他球員所能獲得的資源遭到排擠、壓縮。不過，同一支隊伍的球員，在談話中仍常以「擬親族敘事」（fictive family rhetoric）的論述來形容彼此的關係，而這類敘述再現了男性球員相互之間的情誼與認同，並能夠產生同類複製，排拒女性參與的效果。

前揭關於職業運動員的研究，點出職場的陽剛文化，不僅僅存在於正式的工作表現當中，也存在於勞動者平時的互動與相處當中。因此，以下將先從攝影記者間的人際互動談起，釐清攝影記者的陽剛特質如何在職場中被界定。接著，本文將指出攝影記者如何成功地將其人際網絡轉化為社會資本，產生排除與收編的影響，使得某些被定義為「欠缺陽

剛特質」的女性與男性，喪失成為攝影記者的機會，進而鞏固攝影記者行業作為一個「男人世界」的面貌。

### 一、陽剛特質在攝影記者人際互動與網絡中的體現

**A8:** 攝影記者一直都是報社弱勢，相對的，大家都有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感覺……你今天會講到你在報社怎樣，我也會講說，慢慢就覺得，你也是這樣，我也是這樣。另外一個是說，攝影記者常常，在靠著身體的狀況下，那種感覺是，我不曉得你知不知道，面對面跟肩並肩那個感情比較好？

**問:** 肩並肩？

**A8:** 對啊。攝影記者沒辦法，大家都要卡位，為什麼要卡位？沒辦法，最好的角度就這樣窄窄的而已，那長期下來就會有碰撞，會有摩擦，就會有溝通，慢慢就變成好朋友、好哥們，男生女生都一樣。

**問:** 但是肩並肩也蠻容易會發生衝突的嘛，為什麼這樣感情還會很好？

**A8:** 一衝突就會有人來協調啊……因為一開始會起衝突都是不很熟才會起衝突，可能今天你碰到我，下次就是你碰到我〔我碰到你〕，就是會扯平就對了，慢慢的，這種其實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變成一個非常好的工作伙伴，這也都是經過時間慢慢演進的。（受訪者，A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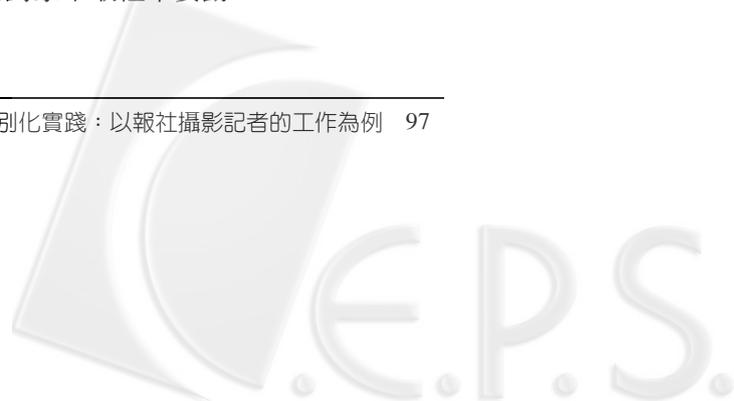
以上的談話，其實進一步點出攝影記者必須彼此溝通、協調、互動，否則他將長期活在與同業衝突的壓力下。因此，藉由培養彼此的默契，攝影記者不僅僅化解了衝突，甚至將並肩工作的形式視為一種男性情誼的展現。

實際上，對許多攝影記者而言，他們生活中最活躍的社會網絡，往往就是工作同業。一方面，由於各報攝影記者編制有限，在每個新聞現

場，大多只會派出一名攝影記者採訪，<sup>[7]</sup>所以攝影記者遇到同業的機會，往往比碰見同事的機會大得多。這無疑也增加了攝影記者相互互動的機會。另一方面，由於攝影記者工作時間長且不固定，因此也相對弱化了他們與他人發展人際關係的可能，而工作上所接觸的同業，也就成了每天互動最深的一群人。例如，過去黑白相片時期，大家相約回某報報社的暗房沖洗照片、交換心得；進入彩色照片時期，大夥齊聚在某家相館門口等待沖印、抬槓說笑。攝影記者互動頻繁若此，關係自然容易建立。即使到了今天，攝影記者人數較早期為多，加上影像科技發達，彼此無法再利用沖洗照片的空檔聯絡感情，但許多攝影記者仍然表示，他們還是常常藉由轉寄信件或 MSN 等方式，與同業聯絡近況，交換工作上的情報。

除此之外，相較於文字記者彼此間的「爾虞我詐」，攝影記者往往會強調自己與同業的「兄弟情誼」，乃是建立在更為光明磊落的基礎上。許多受訪者強調，雖然採訪時，大家難免肢體碰撞，甚至衝突，但是這些競爭都是檯面上的，而非如同文字記者一般，必須靠著私下經營人脈，在檯面下運作。因此，攝影記者常覺得，雖然在工作現場發生了衝突，但這樣的關係較文字記者來得真誠。例如，目前身兼報社影像部門主管的攝影記者 A11 便認為，文字記者為了搶獨家，「底下的小動作很多，但攝影不是，拍攝的對象是公開的，每個人判斷不一樣，大家各憑本事。拍到畫面就是你的，沒必要搞小動作」。換言之，攝影記者以自身的「真誠」對比文字記者（他者）的「狡詐」，建構出一個更為優越的陽剛特質形象與認同。

有時攝影記者需要集體對抗外人，則更加深了攝影記者將彼此視作整體的傾向。例如，面對不配合拍照的受訪者，攝影記者會透過集體壓力，迫使對方妥協。又如，面對有線電視攝影記者的步步進逼，報社攝影記者也傾向團結、對抗。女攝影記者 A23 還打趣說，攝影記者彼此奧援，往往讓許多「想找麻煩」的對象不敢輕舉妄動。



大家的感情就像兄弟……怎麼說，我講一個笑話給你聽，有一個攝影他就跟人家軋車〔台語〕，就是在路上不知道怎麼樣了，就是兩台車在那邊軋來軋去，最後就開到那個沖洗店，他要去洗照片，開到相館那邊去，最後一堆攝影通通衝出來，對方嚇一跳，還以為是堂口……一堆攝影通通跑出來，對方以為是真的『兄弟』！（受訪者，A23）

以上這段話，暗示攝影記者集結之後高度陽剛的威嚇態勢。倘若進一步觀察攝影記者的日常生活互動，則更可以看見所謂的「男性情誼」，如何在攝影記者平日的相處中具體實踐。許多攝影記者都曾提及，由於攝影記者人數少，而且以男性為主，因此在「大家都是男人」的情況下，自然可以比較「不拘小節」。然而，究竟什麼樣的互動模式是「在男人世界裡，再自然不過的互動行為」，卻值得繼續深究。

首先，對許多攝影記者而言，「喝喝小酒」是攝影記者工作之餘，用來聯絡感情的重要方式。<sup>[8]</sup>然而，攝影記者聚會中的飲酒，並不能只被理解成一種尋歡作樂的行為，相反地，這是他們發洩不滿、尋求同儕支持的重要儀式，也展現了他們如何以男性文化彼此連結的過程。許多受訪者表示，由於攝影記者的工作辛苦，在報社內部又居於弱勢，因此有人便將同業間的喝酒聚會，當作彼此一吐苦水、一傾鬱悶的機會。不僅如此，攝影記者也常以高度理想化的說法，呈現酒攤文化與男子氣概間的關聯。

同樣身為攝影記者的鍾宜杰（2006：52），在研究中敘述早期同業的酒攤文化時，便以高度浪漫的筆調形容，「一個好的攝影記者不僅要有酒量、有酒膽，還要能徹夜飲酒後，隔天正常跑新聞，拍出好照片。他們就像前線戰場的士兵，要能喝酒狂歡，也要能奮勇殺敵！」新手攝影記者 A3 的經驗，更具體說明攝影記者如何藉由飲酒的儀式，來強化連結與認同。



A3：之前 SARS 完啊，然後我們有慶功啊，然後比如說有新進同仁……就是之前蘋果〔指《蘋果日報》〕那次大換血嘛，就是迎新啊，他們出去吃飯都一定會喝酒，通常菜的〔新人〕都會被灌這樣。然後我通常都會比較孬……因為我都會裝孬、裝沒用嘛，說我的胃不好啊，就一副病恹恹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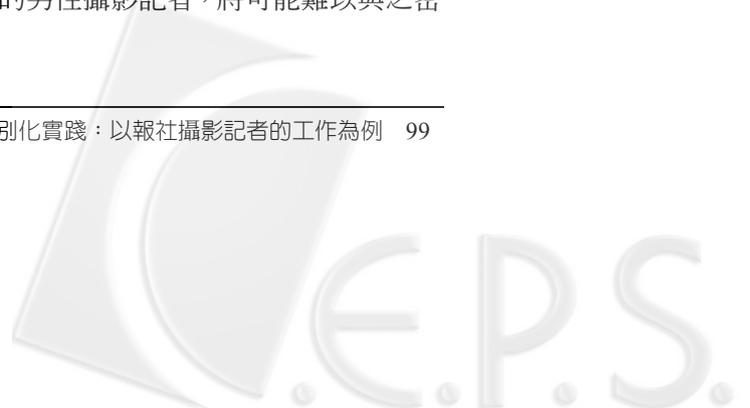
問：為什麼新人一定要特別被灌啊？

A3：我也不知道耶，因為有一些就是剛進去的學長，那時候他們都是被灌到臉很紅啊，然後都快不行了……怎麼講，就是其實就好像是一個過程吧，就是你剛進來就有些事情就是一定要你去那種感覺。（受訪者，A3）

換言之，當喝酒被視作男性理所當然的集體聚會模式時，不喝酒則意味著有更少的機會與同業建立人脈。因此，即便許多攝影記者本身並不喜歡喝酒，但是會把喝酒當作打好關係的一種社交活動。事實上，除了喝酒之外，抽煙是另一個「在男人世界裡」典型互動的例子。

就男生嘛。男生就相處，喝一點酒、抽一點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社交行為啦。（受訪者，A1）

菸酒文化當然不是攝影記者或任何男性為主工作中所內生的職業特性。然而，當抽煙、喝酒被攝影記者視作「男人間再正常不過的互動」時，許多女攝影記者往往遭遇難以加入這類社交活動的窘境。幾位女攝影記者曾提及，自己的家人或伴侶，無法接受自己每天滿身煙味，或帶著酒氣晚歸。另外，她們大多也清楚意識到，自己若如同男攝影記者一般抽煙、喝酒，並不符合社會文化對女性的要求及規範，甚至可能招致更多的側目與鄙夷。同樣的，當男性同儕視煙酒文化為「習以為常」的固定社交模式時，沒有類似習慣的男性攝影記者，將可能難以與之密切互動。



許多攝影記者也並不諱言，這行業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環境。因此，許多與有關暴力或是性的主題，常出現在說笑之中。特別是幾位攝影部門的男性主管都認為，有時候攝影記者確實會「亂開玩笑」，因為大家覺得自己處於「男人的世界，聊起天來難免葷腥不忌」；女人如果感到不適應，最好的方式是「調整自己」，畢竟整個環境很難為了女人而有所轉變。至於對於葷腥話題表示反感的女性，則常被解讀為「過於柔弱」、「太過敏感」，不適合擔任攝影記者。

整體而言，所謂「再平常不過」的互動模式，正反映出一個職場中，經常或習於依循的社交行為範本。這樣的互動模式其實已經超越了個人喜好的層次。如同前述，許多受訪的男攝影記者並不喜歡抽煙、喝酒、粗話或是黃腔，不過某些極端傳統的男性互動模式，卻常被挑選成為足以顯現陽剛特質的「常態」的文化腳本。換言之，即使男性陽剛氣概，亦有從主流強勢到非主流弱勢的光譜差異，並非每個攝影記者都喜好類似的互動形式，但「陽剛」仍被奉為圭臬。正如許多研究者所言，陽剛特質的定義是一場關於「正常」與「異常」的戰爭。惟有先確立「正常」的陽剛特質範本後，偏差（deviant）的男性形象才得以被區辨譴責，而王道式的陽剛特質也才得以成為共識，進而攫取行動者的默許順從（Collins, 2005: 96）。

## 二、攝影記者的社會網絡與實質利益間的關聯

欠缺類似的陽剛特質，不僅僅代表無法打入與同業的互動中，也常等於同時錯失了許多與工作有關的資源。以下將進一步指出，陽剛特質作為攝影記者彼此連結的文化機制，如何進而與各種實質的資源交換有關，以鞏固強化攝影記者職場作為男性主控場域的形象。

首先，在攝影記者還得回報社暗房沖洗照片的年代，相關技術與經驗傳承，其實是透過「師徒制」的傳統進行。資淺的攝影記者必須從暗房助理當起，學習基礎技術之後，才能正式升任攝影記者（鍾宜杰，2006：31-32）。即使後期照相館與數位相機興起，暗房沒落，攝影記者的



人際網絡，仍然是初入行新手磨練技術、汲取經驗的重要管道。許多新進攝影記者，對於新聞實務並不了解，對器材的使用與取景的角度也不熟練，此時，資深前輩或同業的建議，便是他們「在職進修」的最佳途徑。攝影記者 A23 便回憶，自己剛入行第一次去拍體操比賽，是「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結果在打閃燈拍攝選手時，當場被資深的攝影大哥痛斥糾正，教他要用燈桿打光，以及要站在何處取景。

其次，報社招聘新手，或是有人打算跳槽，往往要靠攝影記者人際網絡的資訊流傳。對主管而言，透過人際網絡尋找人選，不單可以了解該名攝影記者的能力與個性，同時他的工作態度、與同業的相處狀況，也可以從其他攝影記者口中得知。正如主管 A19 所形容的：「攝影這個圈子很小，所以哪裡缺人，同業間都很快會知道」。

再者，攝影記者的「調片」行為，更須仰賴相熟的人際網絡才能進行。台灣攝影記者圈內習以為常的調片文化，指的是「媒體攝影記者間照片、影片的互通有無與交換使用。報社記者沒去拍或沒拍到的新聞照片，可以向有此畫面的同業索取，回去用在自己的報紙上，不但不必付費，還可以堂而皇之的在照片旁用自己的名字打上某某某攝字樣」（林少岩，1997）。儘管現況下，各報均表明禁止調片的立場，但這類活動依舊盛行（黃義書，2000.05.05）。<sup>[9]</sup>雖然訪談中，絕大多數的攝影記者均表示自己沒有向別人要求調片，<sup>[10]</sup>不過並不否認曾有調片給別人的經驗。林少岩（1997）便痛批台灣攝影記者圈的調片現象，根本原因在於某些攝影記者只想著便宜行事，靠人情拿到其他同業不要的「次級品」交差了事。

然而，也有人綜觀攝影記者在勞動過程中可能碰到的阻礙與突發狀況，視調片為：(1) 現狀報社攝影記者人力不足，而重要場景稍縱即逝；(2) 鏡頭捕捉畫面失誤（如角度不佳）、器材失靈；(3) 與其他報社及電視攝影記者的推擠；(4) 採訪對象的抗拒等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林少岩，1997）。但是，這些勞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並不能作為攝影記者無法順利完成任務的藉口，而記者或是長官「漏不起新聞」的壓力

，更是調片文化難以根除的原因之一。訪談中，攝影主管 A5 直指，有時「調到照片」已經成爲攝影記者工作中的「義務」之一。

〔調片〕這是一個很無奈，但是其實又相當不合理的一個現象……因為報社不願意聘請比較合理的人力……攝影記者，必須要執行這樣的工作，執行調片的工作，甚至……我們已經退休的媒體的攝影部門的主管，他〔當年〕還曾經因為調不到照片，被報社處分的，主管會認爲說……你調不到片，他會質疑說，你的人際關係不好，甚至他會認爲，你沒有完成工作，其實這是很不合理的。（受訪者，A5）

總之，不論將調片視作個人有虧職守的表現，或是將調片視作攝影記者爲完成工作不得不爲的無奈，調片的存在，說明了攝影記者如何將人際網絡轉化爲幫助工作完成的資源。此外，儘管「調片」所憑藉的人際網絡，常有著情感與利益連帶的加乘效果，但攝影記者彼此調片的同時，也常必須考量到人情與利益間的可能衝突；像是願意調片給別人的攝影記者違反了報社的規定，一旦事發，本身也將遭到上級懲處。正是因爲調片有其風險，所以有相熟、可信任的人脈，就變得格外重要。換個角度言之，伴隨調片而來的風險，再次顯示了攝影記者如何仰仗人際網絡作爲完成工作所需的社會資源。

透過以上觀察，本研究希望指出，當特定的陽剛特質被視作融入攝影記者職場文化的必備條件時，許多欠缺類似特質的男女，也等於將錯失許多憑藉人際網絡傳遞的有利資源，如調片、聘僱消息與技術學習等。長此以往，攝影記者的職場，也將因此產生「同類繁殖」的效果，使得其高度陽剛的面貌與職業性別分工趨勢更形穩固。

## 陸、結論



長久以來，對攝影記者勞動的研究，大多把階級支配、缺乏專業當作分析的主要軸線（黃義書，2004；鍾宜杰，2006）。本文則是指出，性別如同階級，乃是理解攝影記者勞動過程的關鍵角度。本研究從攝影記者的職場關係切入，援引「王道式陽剛特質」的理論概念，分析攝影記者如何在實踐、互動與認同上，不斷強化其男性形象。

目前有關性別與媒體勞動的研究多已指出，伴隨性別刻板形象而來的歧視與貶抑，限制了女性在專業場域的發展（Skard, 1989；van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梁慶瑞，1991；沈怡，1995；廖郁毓，2002；賴維真，2003）。研究者也已經發現，許多女性新聞工作者透過壓抑陰性特質，以迎合職場中對於「專業」形象的期待（蕭蘋，2004）。相較於陰性特質，陽剛特質常在分析中，被視為不證自明的靜態壓迫結構，有些論者也未能深究陽剛特質構連產製的社會過程。因此，透過攝影記者的職場實踐作為個案，本文在理論與實證上，對陽剛特質與男性優勢權力在媒體職場的具體形構，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分析。

本研究發現，陽剛特質並非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靜態描繪，反而會在具體場域的制度與文化脈絡下產生變異。因此，本文從攝影記者的正式新聞攝影勞動，與非正式職場人際互動等兩個層面，切入分析攝影記者陽剛特質構成的過程與效果。首先，筆者發現，新聞工作不可避免的監督批判原則，預設了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對立。之後受到攝影記者的分工現狀與攝影器材的侵略性影響，使得攝影記者與採訪對象的衝突難以化解。不僅如此，同業的競爭也進一步激化了職場中的緊張狀態。而許多攝影記者透過挪用社會主流對刻板男性形象的想像與期待，則使得其職場中的陽剛特質與文化一再得以延續。

其次，筆者也發現，藉由共同面對外部的衝突，以及共同參與內部的男性社交儀式，攝影記者成功化解了彼此的競爭關係，並將其轉化為自身可以挪用的社會資本。然而，男性勞工網絡相互連結構成的陽剛文化，卻常產生限制與排除女性參與的效果。換言之，當攝影記者在報社內外不受重視且缺乏實質權力之際，攝影記者在工作中，容易積極挪用

強勢、豪邁等對男人的文化想像，企圖克服正式勞動中的不確定因素，同時建立社會網絡，進而形構出其職場內的王道式陽剛特質。透過這些性別化的互動與實踐，攝影記者得以因應自己親身遭遇的階級困境，也能建立對本身工作的認同。

因此，攝影記者在建立自身對工作與專業的認同時，其實正可以視為一個「陽剛化」的操練過程。換言之，報業攝影記者的勞動並不是「本質上就適合男人」的工作。許多男性攝影記者進入職場後，乃是經由不斷學習、展演與互動，才能夠表現出「恰如其分」的陽剛特質。相較之下，女攝影記者則常因生理性別，被推定為不適合從事攝影記者的工作。是故，她們往往更需要透過展演陽剛化特質，以使自身的能力獲得肯認。

由此觀之，以往論者對當前攝影記者專業養成教育不足的批評（許靜怡，2003），必須放在當下報社組織與攝影記者人力運用的具體制度場域加以理解。短期說來，攝影記者在勞動過程中表現出的陽剛特質，確實產生了達成組織要求與改善自身處境的效果。但長期而論，這樣的作法，將使攝影記者行業變成一個「男性疆域」，其性別化刻板形象與職業性別隔離等現象，必然更加根深蒂固。同時，陽剛特質在工作中的展現，也等於讓衝突與對立成為攝影記者無法卸下的不定時炸彈，並還要求他們以個人化的手段，自行化解報社不當配置人力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按學者理論化陽剛特質的邏輯，在不同場域中，會因為組成份子的差異，導致其界定何謂「王道式陽剛特質」的方式大相逕庭（Pyke, 1996；Chen, 1999；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所以，跨國企業與職業運動定義理想陽剛特質的方式可能極為不同，而事業有成的企業家與驍勇善戰的球員，都可能被各自社群認定為具有陽剛特質的代表。有鑑於此，本文並無意指涉攝影記者是報社組織內唯一或最具有陽剛特質的成員，反之，媒體組織內的其他部門，如文字記者或編輯、媒體主管，也可能各自具有不同陽剛特質的定義與實踐方式。而這些報社內部陽剛特質的光譜差異，有待更多後續研究進行比較分析。

最後，受限於篇幅與研究設計，本文有兩個未能完整分析的面向。首先，本文旨在分析當代攝影記者的性別化勞動過程，因此把攝影記者的日常實踐放在分析的中心，導致未能對攝影記者工作的歷時性變革進行全面性回顧，亦未藉以討論其性別意涵。此外，本文也未能處理攝影記者作品本身構連出的意識型態。正如許多媒體研究學者所言，作者、文本與讀者的解讀，雖然彼此相關，但卻也涉及了不同層次的分析，且各自需要不同的研究設計與方法加以探究（Fiske, 1994；林芳玫，1996）。本文受限於研究發問，無法完全解答這些問題，然而這些面向卻是值得後續研究探索的方向。



## 註釋

- [1] 目前國內學者對於 hegemonic masculinity 的中文翻譯尚無共識。除了「王道式陽剛特質」之外（成令方，吳嘉苓，2005），黃淑玲（2003）則是譯作「霸權男子性」。對此，本文選擇採用「王道式陽剛特質」的譯法，凸顯此一概念強調主流陽剛特質如何藉由社會文化「共識」的意識型態邏輯，以攫取行動者的「甘願」與「順服」。同時，限於篇幅，本文在此不擬對「王道式陽剛特質」的理論概念的演變、應用與批判做全盤性的回顧。對此，建議可參照 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 發表之著作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 [2] 儘管人類學者 Alison (1994) 並未在其研究中，直接使用王道式陽剛特質的理論概念，但是她主張日本企業視之為常態的女服務生陪酒文化，可以用「王道」的概念加以定位理解。
- [3] 「攝論」是由一群攝影記者發起的虛擬論壇，它是為台灣攝影記者所量身訂作的網站，也是一個談論攝影記者相關事務的網站，舉凡新聞採訪、新聞攝影、視覺、版面之理論與實務，或攝影與法律、國外經驗等事例，以及攝影同業間、社內與文字、編輯、美編間的配合問題，皆為討論範圍。網址：<http://www.geocities.com/Tokyo/Bay/5254/home/home.html>。
- [4] 至於什麼新聞路線是被獨立出來的，各報之間仍存有差異。像是《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的影劇攝影記者都是獨立於一般路線之外，但《聯合報》則否。不過一般而言，「體育」、「影劇」的攝影記者大多是固定的。
- [5] 這種文字主導報導走向的作法，即使在壹傳媒以強勢的影像文化進駐台灣之後，也仍然存在。幾位任職於《蘋果日報》的記者就曾向筆者抱怨，他們的工作就是「一直拍、一直拍」，但是最後登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卻遠非他們所能掌控。

- [6] 廣角鏡可以達成使影像產生形變，使畫面產生戲劇感的效果（鍾宜杰，2006）。
- [7] 但若該則新聞已經被先行判定為重要的新聞事件，報社也會另行調度充足的人力支援。像是訪談進行期間，剛好遇到的「228 手護台灣，手牽手大遊行」與「313 泛藍團結大遊行」便是一例。
- [8] 例如，幾名資深的攝影記者均指出，戒嚴之初、台灣群眾運動方興之時，攝影記者絕大多數的時間都必須在街頭度過，而工作結束後唯一的休閒活動就是「喝喝酒、吃吃宵夜」。
- [9] 前《勁報》攝影組副組長黃義書（2000.05.05）曾經這樣形容：「每天下午，攝影記者聚集的相館中，總有此起彼落的調片聲：『誰有 119 的照片？』『有沒有握手的、舉手的？』甚至有電話調片。近來更方便，直接 E-mail 即可，連拿照片的路都省了。多少攝影記者每天就在這調片過程中，完成一天的『採訪』工作。」
- [10] 訪談中，攝影記者否認自身曾經調片的態度，可能也與各報禁止調片的政策有關。



## 附錄

表 A：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年資	工作現況	訪談時間
A1	男	5 年	攝影記者	2003.09
A2	男	15 年	攝影記者兼攝影組組長	2004.03
A3	男	1 年	攝影記者	2003.10
A4	男	7 年	攝影記者	2004.03
A5	男	18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3.10
A6	男	22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3.12
A7	男	17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3.10
A8	男	16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4.02
A9	男	16 年	攝影記者	2003.10
A10	男	17 年	攝影記者兼攝影組組長	2003.11
A11	男	20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4.03
A12	男	14 年	攝影記者	2003.12
A13	男	3 年	攝影記者	2003.12
A14	男	3 年	攝影記者	2003.12
A15	男	1 年	攝影記者	2003.10
A16	男	1 年	攝影記者	2004.02
A17	男	2 年	攝影記者	2004.02
A18	女	6 個月	已轉換跑道	2003.09
A19	女	17 年	攝影記者	2003.09
A20	女	10 年	攝影記者	2003.10
A21	女	5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A22	女	7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A23	女	8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表 A (續)

編號	性別	年資	工作現況*	訪談時間
A24	女	5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A25	女	2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A26	女	13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0
A27	女	16 年	攝影記者	2003.12
A28	女	18 年	攝影記者	2004.02
A29	女	1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2
A30	女	1 年	攝影記者	2004.01
A31	女	5 個月	已轉換跑道	2004.02
A32	女	1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09
A33	女	16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4.03
A34	女	15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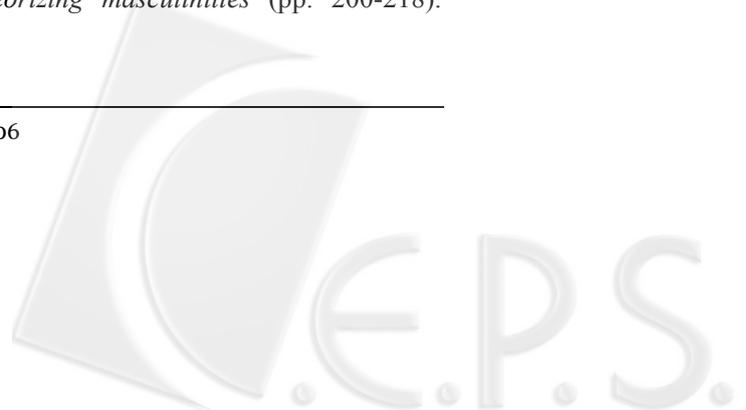
## 參考書目

- 方秋湖（1999）。〈勿讓視覺文字化〉。上網日期：2006年12月31日，取自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Bay/5254/article/ac13.html>
- 成令方、吳嘉苓（2005）。〈科技的性別政治：理論和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科技、醫療與社會》，3：51-112。
- 沈怡（1995）。〈從女性新聞到人性新聞——性別情境新聞處理與兩性新聞工作者待遇之比較以臺灣報業一般狀況與美國全國性報業、瑞典報業為例〉，《台大新聞論叢》，1（3）：126-153。
- 林少岩（1998.07.01）。〈中文報紙「新美學主義」：中文報紙的視覺困境與突破〉。上網日期：2006年12月31日，取自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Bay/5254/article/ad1/ad1.html>
- 林少岩（1997）。〈你吸毒嗎？〉。上網日期：2006年12月31日，取自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Bay/5254/article/ab1.html>
- 林芳玫（1996）。《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台北：巨流。
- 林育德（2002）。〈賣花者言〉。上網日期：2006年12月31日，取自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Bay/5254/article/ac14.html>
- 孫志硯（2007）。〈論述、權力，與報業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維繫〉，《新聞學研究》，91：125-169。
- 孫瑋芒（2000）。〈追獵影像的群犬〉。上網日期2006年12月31日，取自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Bay/5254/article/ab9.html>
- 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台北：遠流。（原書 van Zoonen, L. (1994).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Sage.）
- 許靜怡（2003）。《攝影記者在台灣：專業路漫漫》。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梁慶瑞（1991）。《台北市新聞記者性別分化及性別階層化之研究》。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子明（1993）。〈新聞攝影的省思〉。上網日期：2006年12月31日，取自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Bay/5254/article/ab2.html>
- 黃淑玲（2003）。〈男子性與喝花酒文化：以 Bourdieu 的性別支配理論為分析架構〉，《台灣社會學》，5：72-132。
- 黃義書（2004）。《新聞產製場域中的攝影記者：認知、角色、專業權力及生存心態分析》。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義書（2000.05.05）。〈來一張照片，我們損失了什麼？〉。上網日期：2006年12月31日，取自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Bay/5254/article/ac7.html>
- 楊映（2001.02.25）。〈活在沒有聲音、寂寞的一群記者：新聞攝影的定位與地位探討（一）〉。上網日期：2006年12月31日，取自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Bay/5254/article/ac9.html>
- 廖郁毓（2002）。《台灣報業的生產科技、勞動過程與性別分工：以聯合報家父長的生產體制為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臧國仁、鍾蔚文、楊怡珊（2001）。〈新聞工作者的社會智能——再論記者與消息來源之互動〉，《新聞學研究》，69：55-93。
-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體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
- 蕭蘋（2004）。〈新聞專業中的性別政治：媒體組織對女性記者及其報導的影響〉，《新聞學研究》，81：85-123。
- 賴維真（2003）。《女性新聞工作者勞動經驗之研究》。中正大學勞工所碩士論文。
- 鍾宜杰（2006）。《影武者：台灣戰後攝影記者的習癖與品味的形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Alison, A. (1994). *Nightwork: Sexuality, pleasure, 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rrigan, T., Connell, R. W., & Lee, J., (1985). Toward a new sociology of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14(5), 551-604
- Chen, A. (1999). Lives at the center of the periphery, lives at the periphery of the center: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ies and bargaining with hegemony. *Gender & Society*, 13(5), 584-607.
- Chodorow, N.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odorow, N. (1989).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al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P. H. (2005). *Black sexual politics: African Americans, gender, and the new racism*. New York: Routledge.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nell, R. W. (2005). *Masculinities*. Oxford: Blackwell.
- Connell, R. W., & Messerschmidt, J. W. (2005).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 Society*, 19(6), 829-859.
- Dellinger, K., & Christine, L. W. (2002). The locker room and the dorm room: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wo magazine publishing organizations. *Social Problems*, 49(2), 242-57.
- Fiske, J. (1994). *Media matters: Everyday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ochschild, A.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ndagneu-Sotelo, P., & Messner, M. (1994). Gender displays and men's power: The "new" man and the Mexican immigrant man. In H. Brod & M.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pp. 200-21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eidner, R. (1993). *Fast food, fast talk: Service work and routin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ssner, M. (1992). *Power at play: Sports and the problem of masculinit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Messner, M. (1993). "Changing men" and feminist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ory & Society*, 22(5), 723-737.
- Messner, M. (2000). Barbie girls vs. sea monsters: Children construct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4(6), 765-784.
- Padavic, I., & Reskin, B. F. (2002). *Women and men at work*.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Pascoe, C. J. (2007). *Dude, you are a fag: Masculinity and sexuality in high schoo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ierce, J. (1995). *Gender trials: Emotional lives in contemporary law firm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ierce, J. (1998). Rambo litigators: Emotional labor in a male-dominated occupation. In M. Kimmel & M. Messner (Eds.), *Men's lives* (pp. 300-317).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and Bacon.
- Pyke, K. (1996). Class-based masculinities: The interdependence of gender, class, and interpersonal power. *Gender & Society*, 10(5), 527-549.
- Roos, P., & Reskin, B. F. (1984). Institution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sex segregation in the workplace. In B. F. Reskin (Ed.), *Sex segregation in the workplace: Trends, explanations, remedies* (pp. 235-260).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K. V. Hansen & I. J. Philison (Eds.), *Women, clas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pp. 75-113).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alzinger, L. (2003). *Genders in production: Making workers in Mexico's global fac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kard, T. (1989). Norway: Two-Edged Swords for Women Journalists. In Connection. R. R. Rush & D. A. Norwood (Eds.), *Communications at the crossroads: The gender gap* (pp. 132-141). New Jersey: Ablex Pub Corp.
- Wajcman, J. (1999). *Managing like a man: Women and men in corporate manage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illiams, C. L. (1989). *Gender differences at work: Women and men in the 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lliams, C. L. (1995). *Still a man's world: Men who do "women's"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inn, B. M., & Dill, B. T. (2000). Theorizing difference from multiracial feminism. In B. Zinn, P. Hondagneu-Sotelo & M. Messner (Eds.), *Gender through the prism of difference* (pp. 23-29).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 Constructing Masculinities at Work: A Case Study of the Photojournalists' Work in Taiwan

Ken Chih-yan Sun\*

##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examine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photojournalists in Taiwan construct masculinities in their daily practice. First, I highlight the ways in which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that photojournalists in Taiwan consistently face arise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their work. Next, by analyzing the accounts of Taiwanese photojournalists about work experiences, I demonstrate how these photojournalists manipulate and mobilize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in the labor process to establish their masculine identities and to bond with each other. In doing so, I illuminate how photojournalists strategize the dominant notions of masculinities to combat their inferior class statu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newspaper agencies. In this vein, I argue that hegemonic notions of masculinities are central to understanding the work of photojournalists in Taiwan.

**Keywords:** gender and work, masculinities, emotional labor

\* Ken Chih-yan Sun is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randeis University, U.S.A.